

# 话说上城下城槎城

马 鸣

河源县的设置始于南齐永明元年。距今已一千六百年了。历史上曾先后两三次建城，因此，现在的河源城，有上城下城之分。这两个城究竟那个在先？那个在后？其变迁情况，和槎城得名的由来，我想很多人是想知道的。

一、上城下城，那个是古城？那个为新城？过去把上城称为新城，下城称为老城，对么？

按旧县志所载，河源古老的城是上城。最初的河源城是用土坯垒起来的泥石城。直到元朝末，这古老的泥石城才毁于兵燹寇乱。到了明朝商品生产日渐发达，水路运输日形重要，用船载比用肩挑更显得效益大。因此，重建河源城时就选择了滨临大小两江的下廓部份地方建起了新城。俗称为下城。而且不是用泥石而是用大砖建造了。但由于地势的高低不同，河源城人习惯地把废弃的老城称上城，把地势低的新城称作下城。

下城的造创，大大便利了商业的发展。因为货物的聚散绝大多数由水路运输，从而商店的设置也集中在下城四周兴建。

二、下城建起来之后，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是无疑的。但东江，新丰江的洪水却又给下城带来不少灾难。据县志记载，明朝隆庆辛未年五月初一，洪水一日一夜忽涨三丈多，浸死一百多人，郝、曹两姓有全家覆没的。洪水后瘟疫流

行，又死了百多人。连年的灾难又使河源城人想起了原来的已变成旷土的古城（上城）来了。

因此，从隆庆年开始，便由当地的乡绅组织了一百八十多人，捐款恢复古城，经批准后先把上城的四个城门测定开始用火砖重建上城。由于工程浩大，人力财力有限，因此几经筹措，到万历戊寅年才告竣工，壬午年洪水过后才下决心搬迁到上城。下城的城墙，直到抗日战争前还部份残存，依稀可辨。抗日战争期间，则上城的城墙奉命拆毁，下城的城墙残迹亦趋湮灭。解放后变成水泥马路了。现在的上城环城路，就是原上城的城墙旧基。下城的公园路，至中山路口至八号码头就是下城的旧基。

三、到了清朝乾隆七年陈张翼任河源县知县（即县长）倡议把两城并治。（即上下城并治）统称为槎城。这槎城是因为滨临槎江而得名的。

槎水在那里？槎水在东江与新丰江汇合的那段即现在的六号码头七号码头那段。江水分黄青两色。那段水路还有一个名字叫宝江。我在槎城风光的解说中把它概括为四句童谣：东江新丰江，江水分青黄，两江汇合处，槎江即宝江。

解放前的槎城人口仅八千多。街道也只有一条太平路及短短的一段中山路和狭小的化龙路。长塘路，湖滨路，环城路，公园路，大桥路等的开辟铺建扩宽是解放后的事。如今人口也超出五万了。槎城的发展扩大，繁荣昌盛的未来，还有待于我们的共同努力。

初稿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五夜至廿六日晨。

## 河源人民为什么立祠纪念文天祥？

谢震强 搜集整理

据《河源县志》卷之十二名胜项内记载及访九十高龄、今仍健在的王象如老先生讲述：河源县上城烈女街（即今之东横街），原有祠三间，壮美轩敞，清气满甌，园林清秀。门楣上有块长方形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着“文信国公祠”几个雄浑有力的金色大字，入门屏风竖立一块题有“气节炳耀，循州增胜”的石碑，大厅的前面栽种着两行翠柏，厅堂之上安放**着民族英雄文天祥之牌位及其二女定娘、寿娘之牌位。**据说明初立祠以来粤、赣两省的名人志士常到此瞻仰，逢年过节县城群众多前来祭拜。我县人民为什么要特别立祠树牌纪念文天祥？相传文天祥在河源整军抗元期间被封为“信国公”及其二女定娘、寿娘死义于河源是否真实？对此，我们作了一番调查考证。

据《宋史》记载：南宋端宗景炎二年（即公元1277年），右丞相文天祥带领在南剑（今福建省南平县）重聚之义军，进兵江西，奋起抗元，连续击败元军，收复了会昌、兴国、衡阳、赣州等州郡多处，取得了名闻全国的赣南大捷，文天祥的号令直通江淮，一时形成了抗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胜利局面。

文天祥抗元的胜利，使忽必烈大为震惊，于是任命南宋降将张弘范为元帅，李恒为副元帅，调集精兵二万，偷袭赣州。文天祥因兵少势孤，在赣之空坑为元军所败，退入广东，

驻军携眷寓于河源。《县志》卷之十二、十三均有记载：

“昔文公南奔，携眷寓于河源”，“宋文定娘、寿娘，丞相之二女……，文公南奔，二女死义于河源，因以有二女之墓。”

考证文天祥所写的《集杜诗、二女》序中，也有此记述：

“予六女，长定娘、次柳娘、次环娘、次监娘、次奉娘、次寿娘。丙子（南宋德佑二年，五月改景炎元年）定娘、寿娘以病死于河源之三角。“详见人民出版社编《文天祥选》91页）。《文山诗史》亦有记载：“有定娘、寿娘病死于三角村。”查《楚庭稗珠录》二女亦死义于河源，而死因则异：《志》称二女避元兵至苏坑（现连平县忠信区的一个村庄，原属河源县管辖），过桥惧为追者获，牵衣投桥，并溺而死，衣内有丞相遗谢叠山书，顾托其女，方知丞相女也，土人具棺葬于三角村旗山下。”（注：谢叠山，又名枋得，南宋诗人，是文天祥的同科进士，同举义军抗元的战友。摘自《辞海·历史分册》310页。）而文天祥则于空坑战败之后，南奔河源，准备再度重整军队抗元，宋帝就在文天祥整军于源河期间封他为“信国公”。此说史册亦有记载，正如明朝正德年间副史黄昭记云：“李恒追公（文天祥）贛之空坑、夫人与二子二女被执，送之燕（即今之北京），公与一子奔循”又如龙南令徐上记云：“空坑之败，公与长子道生奔循。”据《辞海》195页记载：“文天祥为元兵所败，走循州，卫王立，封信国公。”以上所说之“循”，是指循州，即今河源。河源古名循州，抗日战争前，河源新城东门城楼上仍嵌“循州古治”之石匾。考之上述有关资料，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携眷驻军于河源及其二女死于河源的传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天祥在河源整军抗元期间被封为“信国公”一事也是

有资料可据的。故此，河源人民特别立祠树碑纪念文天祥是完全出于内心的敬仰。尽管“文信国公祠”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飞机炸毁，但民间还传颂着文天祥的英雄业绩及其二女死义的事迹。最近整理出版的《河源县志》记有文天祥及其二女死义之事，并尊称文天祥为“文信公”，对定娘、寿娘称之为“烈女”。为纪念其在河源被封为“信国公”，特立祠三间，名为“文信国公祠”，并将祠前一条街命名为“烈女街”，让我县人民世代都传颂和学习文天祥那种“时穷节仍见，一一垂丹青”的浩然正气。谢氏族人为其祖谢枋得曾携带定娘、寿娘抗元并死义于河源，故我县之谢氏祖堂为二女立有牌位，并尊称定娘、寿娘为“姑婆”，逢年过节进行祭拜。

当时，因元兵继续进逼，文天祥只得离开河源，转战潮阳、海丰。

文天祥到海丰之后，海盗、卖国投敌的陈懿作了元军向导，立即随尾引带元军突然袭击海丰。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文天祥在海丰北面的立坡岭被元军围捕，次年被送至大都（今北京），公元1282年，这位四十七岁的民族英雄终于壮烈就义。

文天祥从容就义的消息传到河源，相传当时有不少人家，尤其是谢氏一族，不顾元兵的阻挠摆出香案，向着北方，洒酒祭奠。大家都说：“虽不能到燕京祭，也要在河源祭。”

（本文在撰写期间，承蒙刘寿榕、魏邕宏、陈美权、李道行、王象如等老同志、老前辈提供资料和审阅修改，在此表示致谢！）

## 漂 湖 岩 赞

· 一 良 ·

三河区漂湖乡境内的丛山中，有一座高二百公尺左右的看似平常的小山头。远看山腰缠绕着一条斜斜的黑色巨带，十分醒目。近看，这原是三个连成一线、相距不过四五十米的岩洞。这就是个神话与革命史诗交织在一起的地方。在过去漂湖地方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女飘落在漂湖岩边，她看见穷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十分同情，便造了个“出米石”丢落在漂湖庵前，随手还做了石米筛、石碓臼、石簸箕，石风车。“出米石”中的小洞，给庵里道人、穷人流出白花花的米，多一人多一份，少一人少一份……。“出米石”出米的消息传到了一个贪心的财主耳里，他便带着家丁凶神恶煞般霸住了“出米石”，他嫌洞小出米太少，找来铁锤、凿子要把洞凿大。贪心财主霸石凿洞的消息不胫而走，愤怒的穷人成群结队上山，和庵里道人一块，轰走了贪心的财主和家丁。财主狼狈逃窜却跌落深渊死去，而“出米石”却因被财主凿动而再不出来了……这一传说，除了揭露财主们的黑心之外，也反映了劳动群众的反抗精神，而这一点在现实斗争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山便是曾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使反动派闻之丧胆的漂湖岩。

三四十年前，这里原是个山深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漂湖岩及岩前的漂湖庵隐没林中。正是这隐蔽的所在，掩护

了我河西地下党的活动。

漂湖岩，有一部光荣的革命历史：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共河西县委委员会成立，县委宣传部长王兰便来到漂湖岩下，住进了群众丘东阳家中。

一期期由河西县委主持的训练班在漂湖岩、漂湖庵举办，先后培训了四、五百名来自河源、龙川、和平的党员、干部。

河西区早期的交通站——龙、和、河边境情报站在漂湖岩下的一间新屋里建立了。

最使河西人民难忘的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河西人民第一支武装力量——龙和河边区人民武装工作队在漂湖岩前的漂湖庵成立了。这年的十一月，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王彪率领的短枪队来到了漂湖岩。主力部队的到来，鼓舞了我河西人民。十二月十三日我河西地下党的武装力量配合王彪部队，在中午时分，一枪未发便活捉了船塘最大的地主欧阳瀛洲及伪县参议员欧阳友三，收缴了一批枪枝弹药及一大批粮食、物资。这一仗大大鼓舞了河西人民，大煞了国民党军和土豪劣绅的威风。

这支开始只有三十多人的武工队，很快发展到一百二十人。

漂湖岩，你为革命献出了一切。

一九四六年春，敌人反扑了，漂湖岩经受了敌人三次腥风血雨的“围剿”。国民党军化装成进香的乡民，战战兢兢地上山，妄图袭击我武工队。但迎接他们的不是一顿枪弹，便是一个空庵。武工队员们依仗熟悉的地形和险要的地势，依仗革命的漂湖人民，依仗漂湖岩的野果野菜，度过了白色

恐怖的艰难岁月。

敌人哪能料到，围剿反而煽烈了革命的烈火，这年冬天，我河西地区一支支人民武工队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三河的“猛龙队”，“樟溪的长江队”，黄沙的“麒麟队”，船塘的“猛狮队”，新寨的“猛虎队”，流石的“翻身队”，上莞的“飞龙队”、“下虎队”、“飞豹队……这一支神出鬼没武工队里相当部份骨干是来自漂湖岩前的训练班。

漂湖人民，在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神话终归是神话，“出米石”给凿坏了，不能再出米了；神仙也无可奈何。然而人间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扭转了乾坤，漂湖人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过上了其乐融融的生活。如今，漂湖人民正像全国人民一样，意气风发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他们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丽更富饶。到时候，谁都会惊叹：漂湖岩，你是美丽幸福的地方。

# 槎城星火

——读书会的回忆

黎明

(于1946——1948年)

1946年，中共后东特委钟应时同志来到河沅县立中学。不久，地下党员钟雄亚也来了。雄亚同志开始任高秋三班班主任兼国文教师，后来任高春三班班主任和国文教员。

雄亚同志第一次把我叫到房里谈话，是1946年的冬天。他住在和钟应时同志相邻而又相通的一个房子里。窗子只有疏梗，没有窗页。我进去之后，雄亚同志便拿一纸做的活动的窗帘将窗遮住，然后才开始谈话。钟应时同志在旁边坐着，然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微笑着，直到我们整个谈话的结束。

雄亚同志给了我一个文件。那是油印的刘少奇一个报告中的一部分，即关于群众路线问题的论述。另外，他交待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我们找同路人。

第二天，即星期天，我跑到马鸣家里，跟他谈了情况，并一起学习文件，接着琢磨起“找同路人”的问题来。为了便于活动，我们想到了组织读书会。于是由马鸣串联简易师范学校的马（培）佳、殷勤、丘陵（尚熹）、王珊，我串了同班的刘亮。大家聚合了一下算是组织了起来。马鸣是领头的，他又是学生会主席，一切出头露面的事情都由他搞。

朱益明也是读书会的成员，但也是后来参加的。那是1947年的冬天，雄亚同志跟我说：“明年我若不回来，会

有人找你。”1948年初，找我的这个人就是三江中学的教师朱益明。那是一个中午，钟秋英同学给我一封信，拆开是一张字条，要我到三江中学找朱益明。下午我便跑到三江中学。朱益明和三江中学的毛阔平也便成了读书会会员。钟秋英是朱益明的爱人。

这一时期，城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运动。但在黑夜的笼罩下已闪烁着革命的星火。

为了开展工作，马鸣利用在学生会掌握领导权的条件，发起了墙报竞赛，歌咏比赛，演讲比赛和间周周末的游艺晚会活动。我们便在这些活动中抢占阵地，宣传形势，宣传新思想，揭露国民党社会的黑暗。

1947年初，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向解放区进攻时，全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钟雄亚同志亲自指导我们演出《鬼夜哭》。这出戏反映国民党士兵强烈的反战情绪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还把故事的发生地点放在四平街的战场上。现实意义更深，收到更好的效果。

这年，河沅本来闹着饥荒却又发生了一次大洪水，国民党政府在头塘东岳庙放的大米被大水浸了，群众甚为气愤。恰恰又有私商从粮仓运粮出口，一些百姓便鼓噪起来，拥上粮船将米抢光。那时正当全国的学生运动由反内战发展到反饥饿。马鸣就根据上述事件和自身经历，编了《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河中晚会上演出，群众看了，当即哗然。在这一时期，我们还演出了《李伯大梦》。表演一个被军警追捕的青年，由窗口爬进李伯的屋里。李伯在大梦中醒来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天翻地覆——刚才发生了一场“反饥饿”的群众示威游行。这次演出给群众很大启示。

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瓦解敌人，是我们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

1947年元旦球赛中，县立中学和师范争冠军。发生了欧打裁判伍达洲的事。《正义日报》即发表报道并抨击县立中学当局对学生不教育。这是借题发挥骂学校当局的文章。实质是当时青年党在河沅要扩张势力，要插手县立中学，但被学校当局堵塞了。青年党便利用他们控制的《正义日报》攻击学校当局。钟雄亚同志告诉我：“我们要扩大他们的矛盾。”我转告马鸣，并叫来刘亮，几个人合计起来，商定，由马鸣去串通一个学生会负责人黄治国，由学生会出面与报社交涉要求澄清视听。另一方面由我和刘亮分头在学生中进行鼓动，骂报社报道学生打裁判，却不报道裁判不公正，“这是有意歪曲事实，这是对最高学府的侮辱”，正义日报既不正更不义”。学生议论纷纷，本来中午要休息的，大家却都不休息站在走廊里骂。有人提出要质问报社。大家附和，随而推黄治国领头，一拥到报社去把排好的版倒在地下，《正义日报》接着就发出了报社被学生捣毁的号外。接着又发出了《告各界同胞书》，学校当局也紧张起来，布置学生干部查察学生中的青年党分子。军训教官丘学儒还在考场上宣布有任务的同学暂时不考。学校还委托钟雄亚同志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学校当局和《正义日报》纠缠不休，官司直打到中级法院。

1948年，县立中学有两个军训教官，一个是丘学儒，一个是李洁深。两个人平时就争出风头。后来因为轮值挂值星带的问题，一个说该挂在左，一个说该挂右，就闹起来了。开始是辩论，后来就吵架拍桌子。我们早就想打击一

下丘学儒的威风。借平时大家对他有意见，我对一个学生会的负责人也是同班同学苏仲光以及几个班干部说：“我们去李洁深家里采访一下好吗？”大家都说好。“什么时候去”？“军训课最好”。一看军训课连续两节，时间充裕。再者我们的军训课是丘学儒上的，这就实际上罢了他的课。

我们到李洁深家里，他自然高兴，就大骂丘学儒，说他是混饭吃的，他是被开除了军籍永远不得入军门的。丘学儒见我们罢了他的课有点怕，我们又将李洁深的话送回他听。他就很恼火。于是乎在一次全校师生的集会上两个人又在讲台上争吵起来，弄得主持会议的人也难收科。校长只好大声宣布：散会。这场戏真使我们笑破肚皮。

让人们在黎明前的海洋中看到灯塔，是我们这一时期的根本工作。

因为读书会还是半公开的，所以彼此接头也不多。读物也有公开，秘密和半公开的。文件资料当然密传，《华商报》和反映解放区的作品《北方文丛》中的《李有才板话》和《洋铁桶的故事》、《荷花淀》等等是半公开的。白区出版社出的进步书刊当然是向同学推荐，公开读的。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上面给我的东西有的是用不署名的邮寄寄来的，数量较多不能邮寄，便由我家在马草地开的一个小铺转到我手上。这个铺后来城镇地下工作队的一个交通站。

当时学校的总务是一个民社党人。他们当然是跟国民党跑的。但也爱挖国民党的烂疤，以见自己高明，显示其在野党派的风度。钟雄亚同志通过多方活动，使这个总务替图书馆订了大量的图书杂志，很多是民盟，民革筹办的刊物，有些还有明显的激进民主思想。钟雄亚同志教育同学要读活书

就要到图书馆去。钟雄亚同志有时还为我们作时事讲演。

1947年冬的刘亮告诉我，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说在东北战场，林彪被击毙。很多同学都议论这件事，以为真是共产党打败仗了。我拿不定主意，偷偷跑去问钟雄亚同志。他极其严肃而又和蔼地说：“我说你们要读活书嘛。看国民党的报纸要看穿它才能把它读活；在他们的报纸上，我们哪一个将领不死过多少回？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形势就明白。”这一下我恍然大悟：又是中央社造的谣。接着，钟雄亚同志又给我看几张从《华商报》上剪下来的战争形势图。这一下我跟同学说理心里就更有底了。

1947年底到1948年春间，是我九连区游击队壮大的时期。农村游击队的活跃使国民党政府大为震惊。国民党县党部给县立中学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再开文艺晚会，图书杂志也受到严格检查和控制。对学生的言论也进行控制。有一次刘亮在课堂里和同学们正评论国民党战争的失败，一个兼我们公民课的国民党县党部教育长却走进课室来，叫刘亮不要再讲。刘亮不服气：“公民课本就说公民有言论自由。”县教育长无话可说，满脸通红恼羞成怒，用手指着刘亮的鼻子说：“我就不准你讲，你再讲我就说你反动。”

国事我们还是要讲的。课室不讲，宿舍讲；人多的地方不讲，人少的地方讲。好几次，星期六晚上，月光下，我们一大群坐在图书馆左侧枇杷树下的几张石凳上高谈阔论。谈着谈着竟一齐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

然而形势要求我们行动更慎重。我们采用隐秘的方式将游击区的《星火》报、《燎原》报传送到同学中去。即使是同班同学有时也通过邮寄。

有一次，我们就把一张《燎原》报从窗口丢进丘学儒的卧室桌上。特别要他看的一则通讯还用红笔划了一个框框。

丘学儒原是伪国民兵团付团长。1948年夏《正义日报》记者采访他时，他就表示，如果共军打木京（他的家乡）他全乡人要起来“自卫”。（记者是在《朝拜木京》一文中发表的）我们要丘学儒看到这则通讯是报导曾天节在和平组织自卫队，企图抗击红军而筑堡栅的。标题是“慈悲警告曾天节，木堡安能阻铁流”。我们是借以警告丘学儒。当然后来曾天节觉悟了，成了革命派，丘学儒还顽固到底。而我们的宣传工作，在当时是有威慑作用的。

读书会的活动时期，没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它为后来河沅城镇解放前夕地下工作队的建立和活动准备了干部，打下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 抗日阵亡爱国军官丘崇昆

李道行

抗日爱国军官丘崇昆，本县上城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祖父丘淑明是清末的儒学教谕，父亲丘秀岩是民国初年官立高等小学堂校长，兄弟叔姪十余人都是中小学教师或文职人员。崇昆自初中毕业后，见祖国积弱，外侮频仍，激于爱国热情，一反传统家风，决意弃文就武，以身许国，并说服年逾耳顺的老母，于1930年考取了广东燕塘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班。经过四年训练，随军见习一年当上了排长。

1936年后，丘以机智灵活不久又被提升为连长。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入侵，全国军民展开全面抗战，时丘崇昆连是隶属于国民党63军军长张瑞贵的186师558团。迨后日军侵粤，丘率军在省内各地辗转迎击，勇敢善战，被提升为558团第三营少校营长。

1943年八月，潮汕战线吃紧，186师（师长李卓元）奉令由从化县防线奔赴揭阳截击日军，该师到达揭阳时，日军已在汕揭边界的古巷设立据点，并于四五里外的形势险峻的洋铁岭周围遍布铁蒺藜，并筑炮垒多座以为屏障。因此，夺取洋铁岭的战斗是这一战役的关键。丘营赶到目的地后，立即召开连排长紧急会议，表示要出奇制胜，誓死夺回洋铁岭，丘崇昆亲率一连为中锋，二三连为左右翼，炮连殿后，连夜摸到山脚小溪边，埋伏在青纱帐里。凌晨时

分，丘一声号令便身先士卒，带领三路勇士，冒着顽敌的密集炮火向山顶猛冲，经过两小时激烈拼搏，一举占领了洋铁岭。师部得到捷报后立即发令奖勉全营官兵，以丘崇昆功劳突出，就地提升为中校营长。

丘营夺取了洋铁岭后，士气大振，官兵们忘却疲劳饥渴，乘胜追击，直插敌巢古巷。当他们接近敌营地边沿时，由汕头起飞的三架日机轮番俯冲轰炸，并以机枪疯狂扫射，配合古巷日敌作垂死挣扎，战斗愈战愈烈，丘崇昆也愈战愈勇，他带领先头部队以掷弹筒和手榴弹，摧毁了敌人的弹药库和军械库各一座，使敌人受到重大损失。当取得伟大战果的时候，日机更加疯狂，数枚炸弹落在他的身边，这位抗日少壮军官光荣地牺牲了。他终年才三十岁。当双方激战时因随军的电讯设备被日机炸毁，得不到及时后援，该营官兵损失达三分之一，而日敌伤亡则多两倍云。

这一战役结束不久，丘的勤务员刘标专程来源城向丘的遗孀李翠眉报丧，哭述这一战役和丘壮烈牺牲的经过，乡人无不感到悲痛。是年冬558团团长到丘家慰问，并发给一份丘崇昆抗日英勇作战牺牲的证书。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又颁予烈士凭证一张、纱纸墨书的慰问信一件、支兑卹金的证券两张。（可惜这些证件在文革动乱时给丘的遗孤文运烧毁了）1944年广东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罗献祥奉令筹办追悼抗日阵亡烈士时，依照规定设置了丘崇昆及旅长钟芳峻等的灵牌入祀忠烈祠，并自任主祭官，率领军政官员及各界代表举行秋祀，用昭忠烈，追悼英灵。（忠烈祠在崇报寺后面，几经变迁现已和崇报寺一起改建为县招待所）

以上事实，是笔者分别访问丘崇昆烈士遗孀李翠眉、遗孤丘文运、及当时在186师直属连连长邝其洪、参与筹办祭祀忠烈祠的县府科员谢荣宗，以及参加过祭祀的刘寿榕、郑强等几位老人所取得的资料，综合整理成篇，以志丘崇昆舍身卫国，奋战日寇的英雄事迹作为启迪后人振作热爱祖国精神。